

直面风险

现代性困境与当代
中国求解

薛秀军 著

Zhimian Fengxian

Xiandaixing Kunjing yu Dangdai
Zhongguo Qiujie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直面风险

现代性困境与当代
中国求解

薛秀军 著

Zhimian Fengxian
Xiandaixing Kunjing yu Dangdai
Zhongguo Qitujie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面风险:现代性困境与当代中国求解/薛秀军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615-3762-6

I. ①直… II. ①薛… III. ①现代化建设-研究-中国②社会管理:风险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1②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221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mailto:xmup@public.xm.fj.cn)

三明市华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21.25

插页:2 字数:375 千字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薛秀军,男,1974年生,河北承德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管理哲学。曾主持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3项,已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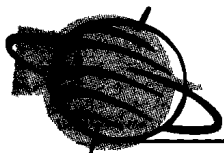


序 言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首次提出“风险社会”，很快这一概念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风险社会”成为检讨与反思现代性的又一重要维度。之后，吉登斯等学者也陈述了相似的思想，由此，“风险社会”研究渐次成为一种热潮。

事实上，“风险社会”这一范畴的确较为真切而准确地概括、反映与把握了现代社会变动不居、流变性的特质。对这一特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对之加以了揭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可以肯定的是，自1848年以来的160多年，现代性所内蕴的不安定性与变动性，非但没有终止，反而具有愈演愈烈之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深度上都叠加式地扩展，并在全球化浪潮助推下，显示出巨大的破坏性，极有可能带来人类社会整体性的撕裂、毁灭。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全球性的气候和生态问题、突发的自然灾害……或许人类真的如贝克所言已经坐在了“现代文明的火山口”上，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不仅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正在为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求现代化而殚精竭虑、积极奋进的国家都可能在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中被无情地抛入一个“失控的世界”。由此,贝克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干脆宣布,我们的现代化正在进入“自反性现代化”,今天的世界正徘徊在“世界风险社会”的边缘。面对这一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世界整体的行动来重新规划和设定我们的未来,就此,贝克等学者开出了一剂世界性的“反思现代性”药方,这无疑是立足当代西方世界面对全球现代性成长矛盾和问题的一种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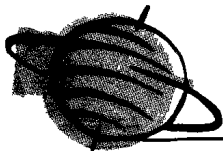
在全球现代性成长、扩张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现代化”无疑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主题。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回首这 100 多年的现代化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在中国的蜕变:从“被迫自发现代化”到“被迫自觉现代化”再到“主动自觉现代化”,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为了有效规避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矛盾、风险与痛苦,探索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现代文明形式。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最初学习的苏联模式自身就有问题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向了终结,更由于中国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世界现代化浪潮而“独善其身”,因此,中国现代化在当代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各国一起直面现代化生成的各种风险与问题,直面现代性发展之困境与挑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现代化生成的民族文化、历史契机,发展的时空序列、具体条件,立足的基本国情、现实动因等都有其特殊性,因此,中国现代化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且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探索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代化不可能,也无法按照西方学者开出的药方“照方抓药”。我们只能坚持实事求是,立足自己的情况,走自己的路——这就使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探索的风险、问题与代价在所难免,由此,如何有效减少现代化探索风险,降低探索代价,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并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原则,“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比较成



功的发展道路。但是不可否认,在时下和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已经或即将遇到的问题更具有复合性与敏感性,解决起来也更为棘手……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潜在的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的各种现代性方案的成败。如此,我们如何提高抵御和防范发展风险的能力,降低和减少发展探索的成本,已成为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之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大大加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后发国家发展优势以及自身对时代机遇的准确把握和全民上下创富热情的充分发挥,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浓缩”了西方现代化300年的发展成就。但是,与此同时,30年的快速发展,也正“浓缩”着西方现代化300年的问题,换句话说,西方三四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直面和不断发现解决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在中国则以共时态的形式集中呈现和凸显出来,并彼此交错而有可能产生新的衍生性矛盾与问题。这是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未曾有过的,也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无法提供答案的。况且,中国现代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原则和基本观念上,不可能完全容纳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和已有模式,更不可能重复西方现代化血腥残酷、背离人性的发展道路,同时,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和发展观念又需要我们在现代化发展中需要兼顾更多的利益关系、承担更多的发展责任,这无疑都增加着中国现代化转型与探索的成本与风险。

当代西方各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已经意识到传统工业现代化的诸种矛盾、问题和发展困境,居于对自身的利益考量,不仅自身要实现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型,而且不顾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差异而要求世界各国按照他们的标准普遍地、同步地接受和实施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与“新规则”,并且,这些国家为了实现自身转型,往往还利用由其操控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投资饥渴症”,转移和转嫁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风险与代价,这些,无疑都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家的现代化发展制造了更多障碍、阻力或破坏力;另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错,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普及,世界各国发展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世界各国彼此交往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各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念、发展理念的相互冲突和矛盾也不断凸显,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危机和发展中突发的恶性事件都可能扩散为世界性的普遍危机和风险,从而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甚至干预,这也为某些国家操控媒体和世界舆论,推行新霸权主义和新强权政治提供了借口与机遇。而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大旗下,世界各国发展中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冲突将更为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和划界标准可能已经无法全面正确地衡量当今世界的形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无疑在未来世界发展新格局转换中将面临更多不确定的挑战与发展风险。

可以说,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舞台的“中心”,同时,其也积聚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与挑战。贝克等学者立足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状况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风险与问题,把握了传统现代化或工业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困境,但是其开出的药方还更多是西方特色的,对中国现代化而言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对世界整体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言则依然是无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错综复杂性,以西方为中心和衡量标准从而要将世界现代化带入“歧途”。因此,中国现代化需要正视现代化的全球性和中国特色的特有风险,但是,中国现代化在直面现代化的发展风险、直面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中必须作出自己的探索与回答——能否坚持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破解人类现代性的发展难题,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回答将更有代表性、前瞻性和现实说服力——今天,当代中国提出和正在贯彻实施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正体现着这一探索方向,其探索的结果,不仅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败,对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和示范,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薛秀军博士的论著《直面风险：现代性困境与当代中国求解》正是以此为基点，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风险从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理论争鸣与实践探索等多个维度做比较全面的检视，并以此探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和阐释创新空间，深化和拓展对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的重大意义、内在逻辑结构、现实关注和着力立足解决的焦点问题的揭示与明确，这对拓展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审视视野，创新中国现代化发展思维，无疑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相信薛秀军博士的这一成果必将能够有助于深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我也相信薛秀军博士以此为新的起点，在未来的学术探索道路上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为第一个阅读本书稿，并在他撰写该文稿过程中时常与之讨论相关问题的同事和朋友，很荣幸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也很乐意将我读后的感想陈述出来。且当为序。

杨 楹

2010年10月

于厦门·集美·华侨大学 F4-401



目 录

序 言

导 论 以科学发展观应对现代化风险.....	(1)
------------------------	-----

第一章 “风险社会”的来临.....	(9)
--------------------	-----

第一节 风险问题研究的理论回顾.....	(9)
----------------------	-----

第二节 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风险	(22)
----------------------	------

第二章 现代化与现代化的风险	(37)
----------------------	------

第一节 现代性与现代化	(37)
-------------------	------

第二节 风险与资本主义现代化	(66)
----------------------	------

第三章 现代化风险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	(82)
--------------------------	------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化	(83)
----------------------	------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风险和“风险社会”.....	(127)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风险.....	(169)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69)
---------------------	-------

第二节 直面“风险社会”的中国现代化.....	(178)
-------------------------	-------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规划	(222)
-----------------------------	-------

第一节 发展的反思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223)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之科学属性和人本向度.....	(261)
--------------------------	-------

第六章 科学发展观:应对现代化风险的新思路	(278)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审视与创新.....	(278)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	(291)
------------------------	-------

第三节 民生建设的发展支点.....	(309)
--------------------	-------

参考文献.....	(323)
-----------	-------

后 记.....	(328)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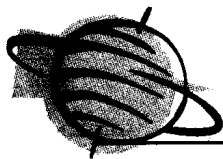
导 论

以科学发展观应对现代化风险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如果说前现代生活的特质是“凝固”，则资本主义化、全球化、现代化交织的现代生活的特质就是“变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无穷无尽的风险。“自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力求做到至善至美、无懈可击的核动力时代、化学技术时代和基因技术时代，人类经过多少世纪的探索而逐渐普遍认同的保险原则却在核电站等一系列至善至美、无懈可击的光环面前止步了。无论从经济学意义上，还是从医学、心理学乃至文化和宗教意义上说，要对那至善至美、无懈可击的神秘光环所笼罩着的核风险进行保险都会让人觉得无从保起。随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的不断増加，可以保险的领域却反而越来越小了。”^②在这里，或许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断言的，我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我们不懈追求的现代化，正在将我们引入一个我们所不能把控的“风险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5 页。

^②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2～73 页。



“风险是永恒存在的”,“风险至少是伴随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甚至有可能人类社会自身刚刚诞生时就已经浮现了。所有的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①然而,在资本主义所引领和形塑的现代社会,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社会自身的而不仅仅是自然的、常态的而非偶然的社会发展风险却不断被凸显出来,以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以理性原则和科学精神构建的自组织的“人造社会”,“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②。

客观地讲,正如贝克所承认的那样,自从人类社会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以来,包括饥荒、瘟疫、自然灾害等在内的各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一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财富丰足年年盈余,福利国家取得一系列成就,科学技术上的尽善尽美几乎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开创出人类富足、丰裕的美好图景的同时,其所内蕴的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内在矛盾和风险也在不断积聚并日渐显现出来。于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风险的争论,就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种争论,最早是从核能使用过程中所潜藏的风险开始的,并且,争论的话题很快就扩展到全球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更广泛的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风险讨论中发生过一个重要的转向,这一变化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已经出现,但在发生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这一年,即1986年成了这种变化的转折点。关于自然、社会体制、科学、技术、专家意见以及发展的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崩溃了,由此引起的极端不确定性、焦虑、冲突、对抗性和差异第一次接受人们的反思”^③,正是在此背景下,贝克和吉登斯等人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或者说,我们正处在从传统(工业)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而且,这种转型正在以全球规模悄悄地发生。因此,反思现代化意味着全球化,风险社

①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3页。

③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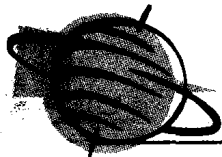
会就意味着全球风险社会”^①。在贝克和吉登斯等人那里,“风险社会”是与他们的“反思现代性”或“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正在进入“自反性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②在他们看来,正是西方现代化曾经赖以维系的进步观念、理性原则、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等等,现在却在全球范围内将现代化带入一个无法预测、难以把控的“风险社会”——“现代社会凭藉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当然也削弱着自然的技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和连续状态。在这个新阶段中,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③——“现代性从工业时期到风险时期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且让我们把自主的、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化的过程称为自反性。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指导致风险社会后果的自我冲突,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根据其制度化的标准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④。贝克等人相信,西方工业现代化正在呈现出的“自反性”及其将全球引向“风险社会”的可能性是工业现代化自身逻辑无法解决和无法突破的,其唯一的有效应对之策只能是以新的现代性即“反思现代性”来置换工业社会的现代性——“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也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阈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

①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②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和[英]斯科特·拉什著:《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页。

③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和[英]斯科特·拉什著:《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6页。

④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和[英]斯科特·拉什著:《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10页。



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所以，“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①

应当说，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敏锐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被历史扬弃的必然性，并且，贝克等人也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所面临的整体发展风险，并不是传统社会的“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更多的是“人为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②，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自身内在结构所内蕴的自身无法根除、无法把控、无法超越的风险——“就其蓝图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它内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陈旧的或传统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工业时代自身的结构和产物。”^③但是，在这里，贝克和吉登斯等人都相信，颠覆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扭转资本主义现代化奔向“风险社会”趋势的并非是“马克思式的社会革命”，也不会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极端不信任”和“自我拒斥”——“工业社会的活力削弱其自身基础，这一概念使人想起卡尔·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是其自身掘墓人的说法，但它的含义完全不同。首先，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我们重复一遍——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其次，这也就意味着削弱工业社会结构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由此导致的新格局与业已失败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断言的是，高速的工业活力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社会，无须初始阶段爆发革命，绕开了政治争论和议会与政府的决策”，“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可以断言的是，不会发生革命但却会出现一个新社会，而这恰恰是简单现代化问题上的两大权威派别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者异口同声认为绝不可能的。……新社会并不总是诞生于痛苦。日益增长的贫困、不断增加的财富和东方对手的消失使问题的类型、相关程度以及政治性质的坐标轴发生了变化。瓦解的迹象、强劲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技术化以及很高的就业保障可以释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③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放出推动或携带工业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风暴。”^①——贝克等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既有框架内进行一定的“改良”，以一种新的现代性置换传统的工业现代性，就能够纠正现代化自身发展的“悖论”，超越和规避现代化的风险。这，就是他们所强调的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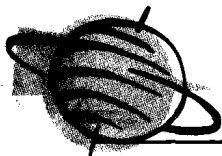
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反性”及其所内蕴的整体的、结构性的、自身无法克服的风险，马克思早已洞察。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发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中，工人和自身的生产创造能力、和自身生产的劳动产品相矛盾或者说相“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②在这里，工人的创造能力相对于工人自身的命运具有某种“自反性”——工人想要把控自己的命运，就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生产创造能力，但工人提升自身的生产创造能力，却反而使其不断丧失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从分工的视角出发，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野中，对这种“自反性”悖论作了更为深刻的揭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并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③这种生产劳动和社会发展的“自反性”或者说“异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达到了顶点，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和[英]斯科特·拉什著：《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6页。



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内置的对立、冲突的极端化、普遍化以及社会整体风险的积聚化和常态化——“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展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悖论”或者说“自反性”从根本上看是源于主导现代化的资本主义资本增值逻辑背离人性、背离人的真正现实需要的片面的“物的”发展模式所导致。这种发展模式，在使“物”不断增加、不断增值的同时，却使人不断贬值、片面化、边缘化、被肢解和被矮化，从而最终必然导致人的生存危机。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还只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越生产越使自己置于“生存危机”的风险中；则今天的现实是，按照这种既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越发展则全人类越将被置于“彻底毁灭”的风险中。虽然，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看到了自身所范导的现代化内蕴的各种风险，并采取了种种措施去消除和预防这些风险，因此，今天看来，在发达国家，工伤、矿难、贫穷、疾病等“工业社会的风险”确实在减少，但是，由于风险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内在特质，是其发展逻辑内蕴的“副产品”，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和预防其内在的各种发展风险，甚至，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风险将会以新的形式不断积聚、积累，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其将可能形成毁灭整个人类的“灾难”——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生态环境危机、足以将地球毁灭数次的大量的核武器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无一不有可能将现代文明彻底毁灭。因此，转变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消除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支配将成为人类“自我救赎”的必然选择，但是，资本主义自身是无法完成这种“自我救赎”的，新的避免进入“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必然也只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和发展逻辑上。从这一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就不仅对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转向也将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就当代中国而言,置身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语境中,其所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同时,它也面临着自身现代化的各种固有的风险与挑战:首先,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和以不同的文化认识)”^①,面对波及全球的核威胁、生态环境危机、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和大规模的传染性等疾病等,作为世界现代化重要一环的中国现代化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而更为棘手的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身转型期的各种固有的内在发展风险。一方面,“从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来看,中国整体上仍然属于初级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基本上与西方国家的简单工业化阶段相近,中国目前正在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这意味着与初级工业化相联系的生产事故、失业风险、意外伤害等风险大量存在”^②。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从国际经验来看,正处于人均 GDP 突破 1000 美元后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期。当下中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③。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于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能够学习和借鉴,完全靠“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起来,所以其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身探索的风险。而且,由于中国现代化自身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均衡,贝克所分析的在西方历时态呈现的“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工业社会的风险”和“风险社会的风险”可能在中国会以共时态的形式出现并交错纠缠在一起,从而有可能进一步酝酿和触发更为复杂和更加具有危害性的“次生性风险”。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现代化在快速“浓缩”人类几百年现代化成绩的同时,也快速“浓缩”了人类现代化的所有风险与问题。虽然,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② 刘岩著:《风险社会理论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3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6 年 10 月 19 日第 1 版。